

再現與感知

——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

Charlotte Furth(費俠莉)*

蔣竹山譯**

「身體史」目前成為顯學，乃奠基於上一代歷史學、人文學科和人類學的學術成果。雖然這股潮流是由象徵人類學所開拓，而後由傅柯(Foucault)及其傳人發揚光大，女性主義者其實亦扮演重要的角色。作者綜覽近來身體史的研究概況及嘗試將自己的著作置於此脈絡下，進而提出兩種詮釋類型：再現(representation)的歷史和經驗或感知(perception)的歷史。最後則以討論認識論的議題來總結，因為這正是當我們將人體作為學術探詢的主題時就會涉及的議題。

關鍵詞：身體史 醫學史 身體 再現 感知

*美國南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譯自 Charlotte Furth, "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該演講稿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發表(1999/11/23), 英文稿預計刊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8 (2000/8)。在此感謝游鑑明老師應允將此稿先譯成中文，梁其姿老師、哈佛大學藝術與建築史系博士候選人曾藍瑩小姐的譯文校訂，以及李貞德老師、祝平一學長的意見。

身體史近來已成為熱門話題。我的作品亦受益於這股研究趨勢。它提供我思考中國史中醫療與性別議題的頭緒，同時也讓我的研究有了更多的讀者。然而，十五年前當我開始研究傳統中國的醫療與婦女歷史時，人體有歷史的概念是異常新穎的；人們對這樣的概念不但感到奇怪，甚至難以接受。我一九八七年論十八世紀中國分娩的論文，是以社會史的主題與取向來形塑的(Furth, 1987)；而當我以月經與女性血液的文化建構為研究對象時，我幾乎成為不折不扣的人類學家，在人類學的領域中，所欲探索的身體本身，相對而言是不具歷史性的……我討論的可能是唐代醫家孫思邈對婦女的看法(我大量引用他的看法)；也可能是一九八五年與陳淑月共同訪問台中婦人的例子(Furth, 1986)。我覺得我已經目睹身體史概念自一九八〇年代中葉以來的逐漸常態化(normalization)。作為一名身體力行者，我已經投注相當多的時間思考並設法趨近此一研究取向的目標，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及陷阱。今天我首先想討論身體史常態化的過程，然後再談一些我認為身體史家在具體研究中終究會面臨的問題。

我將討論兩種身體史研究的廣泛取向：我稱之為再現(representation)的歷史及感知(perception)或經驗的歷史。我的報告將從再見的歷史到感知的歷史，再以一些哲學性的反思來總結。

一九七〇年代，身體透過再現的研究開始進入歷史學中，歷史學家仿效人類學家的方法，將身體視為符號或象徵。一本討論此一主題的早期人類學的重要作品是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73)的《自然符號》(*Natural Symbols*)。而首度令我感到興奮的歷史著作之一是卡洛蘭·華克·拜能(Caroline Walker Bynum, 1982)的《作為母親形象的耶穌》(*Jesus as Mothe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本書處理歐洲中古盛期的天主教圖像中的身體。Bynum 問為何十二世紀晚期到十三世紀其間，基督教徒喜歡作為乳母的基督形象。這種形象

表現在繪畫上，但更多是在僧侶及教士的文字作品中，他們描述忠誠的教徒是由基督的乳汁所養育的。Bynum 讓我們看到這是一個足以開啓基督教神職演進史的問題：當展現天主教的人道主義任務變得重要時，神學家將基督男性化的君王形象轉變成女性化的保姆形象。Bynum 的作品精彩地呈現出性別如何作為符號地被運用，且其運用方式強化了而非挑戰了有關女性特質的傳統觀念。值此同時，她的研究挑戰了二十世紀讀者對於何種身體方足以再現男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本是李歐·史坦伯格 (Leo Steinberg, 1983) 的作品，他指出基督的人性特質再現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母聖子像中，其視覺焦點則在耶穌孩童時的生殖器。¹

作為再現的身體，開始被援引來討論許多歷史，特別是性別意識型態的歷史。電影及廣告、服飾及流行，建構了女性作為欲望的形象；男性商業西裝與工業中產階級的經濟秩序同時出現在十九世紀初期；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的現代主義式服飾設計建構了織品的平面性，寬鬆無腰身的服飾進而代表一九一九年以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女性的自由。就像游鑑明所研究的，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體育的歷史與現代國族主義的歷史有緊密關係(游鑑明，1996)；十九世紀晚期及二十世紀初期公共衛生運動的理想使得人體成為細菌理論及現代化的焦點。殖民式的種族關係，則以極度男性化(hyper-masculine)的非洲男人作為強暴者，或以極度女性化(super-feminine)的亞洲婦女作為誘人的蝴蝶夫人。

我們看到人體在許多層面上作為隱喻(metaphor)的強大力量。在這

¹譯註：Bynum 對 Steinberg 的看法有不同意見，有關這方面的進一步討論，讀者可參見 Caroline Walker Bynum 的近著，*Fragmentation and Redemption: Essays on Gender and the Human Body in Medieval Religion* (New York: Zone Book, 1992), pp. 79-117.

些歷史中，身體成爲符號，闡明了原來隱晦及不易見的宗教、政治、性別歷史的特點。一九六〇年代晚期馬克思主義危機後，身體史受到了人文科學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的強烈影響，²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顯然是主要的革新者，他將醫學、精神病學、犯罪法解釋爲是種透過規訓身體而運作的權力制度。但我認爲女性主義在推動這種歷史的發展上，獨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女性主義在一九七〇到一九八〇年代所設定的目標，是爲了瞭解並暴露一些潛藏的性別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就在我們習以爲常的日常生活中被實踐與再現。那是因爲作爲二十世紀晚期的現代人，我們女性主義者依舊相信使女人不同於男人的地方根源於身體方面。性別差異的討論傾向以生物學的性爲起點。女性主義者的目的即在去除這種看法，以及推翻男性與女性間的社會差異根源於自然的生物差異的看法，這個看法將男女之別正當化了。

身體的歷史在這這裏連結了具有主觀性的再現與圖像，也就是說把文化當作經驗。即使從上述零散的例子中，我們看到不僅生物科學，還有包括服裝、流行、健康、運動、儀式、空間及建築、藝術、宗教等等，都不僅僅止於建立陳規及形象。我們認爲它們有更大的力量。它們理當形塑了主觀性。這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宣稱之一，它提供了身體史的理论基礎。

有些身體史的作品，像高彥頤(Dorothy Ko, 1999)的纏足研究，認爲不可能超越圖像或再現而遠到任何真實的歷史經驗。高彥頤說我們無法透過纏足這個在歷史記載中未曾留下痕跡的沈默的實踐，來想

²譯註：有關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語言(linguistic)或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對西方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影響討論見，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像明代婦女如何看待她們的三寸金蓮，或她們如何感覺或經驗身體。我們所能還原的，只是一些纏足式微歷史所代表的意義，即十九至二十世紀當人們突然之間不停談論它的時候。但其它作品，包括我自己的著作在內，都認為過去身體的經驗至少能夠部分還原。人類在不同時空中與其身體共存的不同體驗能夠被顯示出來。這也就是為什麼研究身體史的學者認為在再現的相關議題之外，身體有其歷史。

此處我們所討論的身體歷史——不是意識型態或再現的歷史，而是感知的歷史。對我而言，最早開始此研究取向的是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 1987)，她是《膚下的女人：十八世紀德國一位醫生的病患》(*Wome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的作者。她釐清了身體有其歷史的想法之所以引起爭議的原因是，它的著作挑戰了自十八世紀以來對人體的科學解釋，這些解釋因其強而有力而被公認為屬「自然」的。她指出我們今日都寓居於生物性的身體之中，我們相信科學證實了這個身體。我們從健康的論述、學校課程、描述細胞、解剖組織、骨頭、血管系統及肌肉等圖表之中認識身體。我們將身體的感覺聯繫至神經及賀爾蒙，將健康和營養聯繫至卡路里、維他命和礦物質的吸收。如果這樣的身體有歷史的話，它是達爾文式的(Darwinian)，那意指我們作為物種演化的自然史。或許身體也有一個人口和疾病的現代史——即傳染病學和人口學。最後，對身體的現代史理解是一部發現史——是科學進步的勝利標幟之一。

身為一位身體史家，Duden 的工作是爲了使讀者想像前人如何寓居於前啓蒙、前生物學時期的身體之中。在過程中，她希望她的讀者瞭解創造現代身體背後的社會因素——一些爲現代科學信仰體系所掩蓋了的因素。她認為現代生物學的身體是在單身而擁有的狀

況下被想像的。我們「擁有」一個身體，而我們具有它先於我們有關係。它是我們與自然聯繫的一部份，是在社會與文化行為產生之前就存在。它也是表達個人主義式的自我感的一個載體。這個身體區分為肉體與精神自我，及男性與女性。你可能猜到，它是「布爾喬亞式」(bourgeois)的身體。Duden 在這的確提出了許多相當廣泛的二元論(dualisms)。

現代人認為生與死是社會科學的事實資料，被表達成生育率及死亡率，而 Duden 所描寫的舊式前啓蒙時代婦女，則將生與死解釋成不同世界之間的歷程；現代人認為健康是自然情況及權利，被社會所保障，而 Duden 筆下十八世紀中葉德國城鎮婦女則認為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現代人視身體是自主及有清楚界線，Duden 筆下人物的身體則對外界、對風、對空氣開放；現代人視身體屬於個人，法律上是等同其它個體，而 Duden 所描寫的人則視他們自己是宇宙論位階這條巨鍊中的一環。

許多對身體史有貢獻的歐洲史學作品所談的都是啓蒙運動以來的大分歧——我所指的是 Michel Foucault、Alain Corbin、³Roy Porter、⁴Thomas Laqueur⁵及許多較不爲人所知的作者。無論你如何評價這些相當沉論

³譯註：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rder and the Fra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trans. 此書在論述身體的氣味如何受到攻擊，因而成為社會驅逐的手段。

⁴譯註：Roy Porter 是當今西方醫史界著作等身的醫學史家，有關他對身體史的研究回顧，讀者可見，“History of the Bod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6-32.

⁵譯註：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譯本見趙鵬譯，《身體與性屬：從古希臘到佛洛伊德的性製作》(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

現代性的學者的個別著作，它們均顯示了，既然身體總是與我們同在，也一直與社會生活夾纏在一起，人們其實從未以孤立的方式來討論身體。而 Duden 的作品之所以較許多其它著作來得重要，是因為它提出了方法論上的假說，讓我們從瞭解作為經驗的身體而獲得相關的歷史知識。

然而，身體是什麼呢？特別是，人體如何成為人類知識的對象？一旦你將身體史當作感知的歷史，你已從歷史走向哲學。為何呢？那是因為人類自我與他人的知識是陷在複雜的認識論(epistemology)問題當中。在歐洲傳統中，這些問題與哲學家所稱的「身/心問題」(mind body problem)糾纏不清。在建構生物學的自然身體過程中，科學思想必定將人類心靈想像成脫離身體的純粹智識。這古典的圖像來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我們有一個物質的身體，和一個足以觀察和分析的心靈，即純屬思想性的「我」。笛卡兒的格言是「我思故我在」，現代哲學家常將這個說法解釋成他相信「機械中的幽靈」(ghost in the machine)。這就是住在身體中而又將身體的物質性當作對象來觀察。這就是有名的笛卡兒的二元論。但是人體真的只是自己純粹心靈反省的外在客體嗎？或者是內在的？在一些更基本的方面，意識不是在身體內的嗎？我想大多數的理學家可能說是。我不確定佛教徒會怎麼說。在歐美，許多反笛卡兒的哲學家嘗試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t)的研究取向。他們認為我們所謂的心靈活動是一種大腦的、化學的功能。在這，心靈變成有點像是神經學的電腦。對於哲學的唯物論者，這是一種對身/心問題的回答。

在駁斥了上述兩種觀點後，Duden 顯示了另類的觀點必須關涉

1999)。中文學界對此書的介紹，參見祝平一的書評，《新史學》7.4(1996)：223-31。

對感知自身的一種另類解釋。她的解決之道是想像本身即是物質真相的來源，強調感知本身就是所謂真實的(Duden, pp. 6-7)，並且援引被稱作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歐洲哲學心理學(philosophical psychology)。簡單來說，現象學是建立在以下假設：客觀的真實不可能從建構我們感知的過程中分開。她的方式是在十八世紀醫生根據與病人面談所記錄的症候與感覺的舊式語彙中，尋找一種身體經驗真相的痕跡。她認為這種語言是來自病人對身體的瞭解，而非得自經過學習的醫學論述。這種語言能夠建構最切身的身體經驗，容許我們想像生活在十八世紀德國城鎮 Eisenach 婦女的具有歷史意味的特殊身體。

講到這兒，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身體史是一種經驗或感知的歷史。我是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認識 Duden，我們的交談對我目前的新書《茂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別，960-1665》(*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⁶有很重要的影響，這已是十多年後的事了。另一本剛出版的是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的《身體的表述與希臘和中國醫學的分歧》(*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亦是採取類似取向。無須說，我非常欣賞栗山茂久的書。以下我將談談這兩本書的類似性及差異性。我想它已經清楚地帶出了我嘗試探索的再現歷史和感知史之間的對照。

在書寫下特定形式的身體的经验或感知的歷史時，我們兩個都在和一個事實掙扎，那就是作為歷史學家所宣稱擁有的身體的知識證明是依賴語言的。在我的例子中，我認為語言的角色是主要的，而我的出發點是我對 Duden 的瞭解。(我也受到我先生是一位哲學家的事實

⁶譯註：中文學界對此書的評介見張哲嘉的書評，《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1999)：211-22。

影響，就像許多學院夫妻，在一次又一次的晚間閒聊中，我已習慣聆聽像身心問題或語言與世界的關聯一類的事物我決定我無法真的知道，在感知形塑對象或為對象所形塑的互動過程中，現象學是否解決了身心問題及建構了真實的本質。但我們全都是藉由閱讀及寫書建構身體史。我們可以主張我們經由語言及書籍認知我們的現代身體：解剖圖、生育、消化、內分泌及其它功能的描述，這整個生物學知識的曲目(repertory)。我決定社會知識依靠符號、圖畫、言辭(words)及必要的符號實踐，這就身體或心靈而言皆然。因此語言對創造社交世界及我們所接受的共同經驗是不可或缺的。我必須透過血 / 氣、陰 / 陽、虛 / 實、寒 / 熱等等隱喻，來嘗試及傳達宋明醫學的歷史的身體經驗。我的理論假設是作為經驗的氣可以和神經一樣的真實。

若要研究身體史，這是我對於在詮釋上必須採用認識論策略的解決之道。栗山茂久的書，雖然不完全相同，但採取了類似的路徑。他的主題是古希臘及古代中國醫學中的身體經驗。他的問題是「什麼是脈？」「什麼是肌肉？」我將討論第一個問題，因為它足以說明栗山茂久也提到感知不是原初的自然經驗，而是倚賴言辭。歐洲及中國醫者——蓋倫(Claudius Galen)與王叔和——花了許多篇幅在嘗試描述人脈，但他們及其門徒最終認為脈事實上是無法描述的。最後，語言或多或少只粗略描述了大概。最後，當歐洲人感覺到擊鼓般的律動，而中國人感覺到流動式的律動(浮、緊、似弦、瀟、細等等)時，他們不完全透過言辭來感覺，即使我們必須用言辭來討論。「身體的表現性(expressiveness)」這個詞彙嘗試要捕捉語言與感覺間的特殊關係。栗山茂久說表現性是藉由聲調加諸說話的，不論我們的言辭是大或小聲，溫和、嘲笑或陰沈，平靜或激動。感覺的文化風格(cultural styles)給予身體經驗一種語調。

我將我的身體語言與社會意義聯繫在一起；栗山茂久則將身體

語言聯繫至一種近乎語言學形塑，但最終又不依賴語言學的特質，即經由觸覺的感知的文化風格。在書末，我們分別有不同的反思。我談到翻譯——如果我們要在我們的身體中確認共通的人文特質，我們需要一種語言可譯性(translatability)的理論。栗山茂久提到一個最後的秘密，生命的存在在於它對感覺是可觸知的，但最終仍捉摸不住。我認為我們應該找尋較好的言辭；栗山茂久則反對言辭。你們可能會說我像是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他聽起來則像莊子。

身體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身體嗎？很明顯地，答案包含了是及否——透過身體，我們被引入反思人文情況的更廣闊的範疇。一件我和栗山茂久以不同方式同在進行的事，是稍稍遠離相對論(relativism)，因為它是身體史的風險之一，就如同對所有強調語言、文本或再現的力量以創造另類真實的文化研究，相對論一樣具有風險。不同文化創造不同身體的理論可能導向某些危險之路。其中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危險途徑之一會導向現代的種族歧視主義(racism)。另一個看法當然是男性與女性因其身體的差異而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我和栗山茂久正試圖建立相對論的侷限，然後將我們對文化獨特的亞洲感知模式的歷史分析，與一些可能透過進一步的考慮語言、身體及宇宙關係而可能出現的普遍現象相聯繫。再者，很清楚地，無論如何，當我們開始使用人體的概念作為研究的組織類別時，所有的「身體史」研究者均難擺脫歐洲思想中進行已久的哲學論辯，這是無庸贅述的。

就身心問題而言，栗山茂久和我又立足在哪裏？讓我暫時說我和栗山茂久的看法是在 Duden 心靈的現象學與法蘭西斯卡·布瑞(Francesca Bray, 1997)徹底的物質主義者(materialist)的人體詮釋者兩者之間。Duden 的書寫事實上像是位基進的基督教徒，對她而言，身體史已成為討論人類受苦與死亡的經驗理解的一種方式，而這是為啓

蒙運動的俗世主義(secularism)所排除的。Bray 的理論取向出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因馬克思主義衰敗而式微的社會主義，這曾使馬克斯主義者的社會學及歷史學的早期傳統失去可信度。她的對象是身體與科技。她將農事、醫學、工具、勞工及家內空間視為物質文化特色。這些社會及文化經驗的塑造不是靠說而是靠做。它們不是語言，而是具體實踐。學習居住在屋內，種稻或織布並非來自言辭而是來自像學習跳舞的某種身體的規訓，而牽涉其中的特殊文化經驗將透過活動來傳達及體驗(Bray, 1997)。

嘗試思考這兩者之間的連續性，引領我們回到作為經驗歷史的身體史與再現歷史的身體史之間的對立。就好像心與身無法整齊畫一地區隔開來，經驗或感知，一旦命名及付諸言辭，可以視為一種再現形式(語言是種符號系統)；而再現如果創造了主觀性，它事實上必定被認為塑造了感知及經驗(語言是表達的語彙)。大部分真正身體史的作品在本質上應是兩者的混合體——我自己的作品就是一個足以說明的例子。然而，我又認為這兩種分析形式有一種顯而易見的緊張關係。凡是強調再現解釋的，總認為在人類主體的心靈(psyche)和對其環境的外在的符號系統(external semiotic systems)之間有距離，其距離隱藏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及使經驗成為將外力結構「內化」(internalizing)的過程。這些學者聽起來更像傅柯的傳人；他們的修辭隱藏了懷疑。那些強調經驗解釋的學者將嘗試使用語言來投射內在主觀世界的想像圖像；他們聽起來更具「文學性的」(literary)；他們的修辭指向移情(empathy)。這兩者的取向相當分明。再者，第二種正是顯示身體有其歷史的最強而有力者。

上述這些給與想要探索身體史的我們什麼樣的教訓呢？

其一是瞭解這些哲學問題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我們需要知道它們如何在我們的研究中運作。但它們對我的作用，或許對其他人

也一樣，是介入的策略(tactics of intervention)。他們打開詮釋的可能性，提供探索我們的史料以及思考它們可能意味什麼的種種方法。然而，雖然我必須面對這些問題，我對它們也有強烈看法，但我們並不必解決它們。我們受到它們的刺激，但我們的作品最後只提出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⁷而非哲學。如果我們忽略它們，我將冒一種知識盲目的風險。如果我們讓它們主導，我們將遠離我們所擅長的地方性知識。

此外，我認為我們應該認識到個別的「身體史」片斷必須要根植於特定的文化領域——例如：性別史、政治史、勞工史、技術史、藝術史、醫學史、科學或宗教史，這些變化多端的人類經驗的幾種可能性。單獨研究狹隘意義的「身體」，犯了重蹈最初身體史的計畫是要批評學術界將身體孤立看待的覆轍。諷斥的是，作為女性主義者研究計畫的身體史，其發展的動機來自於揭露男性與女性的生物學式的再現，這樣的再現已使得似乎只有身體本身才是我們現代人探索性別認同的最終的知識來源。女性主義者已經十分成功地顯示身體史是如何夾纏在文化中，包括現代科學的文化及意識型態。但學界的強調身體告訴我們了身體仍然是非常重要。

身體發人深思，但這提醒我們必須小心考慮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必須了解到這種發人深思的魅力，是二十世紀晚期現代感性的典型產物。我們對身體的注重的確得助於當代科學、醫學，但也得力

⁷譯註：“local knowledge”的概念為美國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所提出，意指在文化比較的思維中，文化的多樣性、特殊性都應保留下來，並以「地方性知識」一詞表示。所謂「地方性」不僅是地點、時間、階級、事件等，更是一種具地方色彩的事實表徵與想像。見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參考書目

一、中文論著：

游鑑明，1996，〈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7.4：119-158。

二、英文論著：

Bynum, Caroline Walker. 1982. *Jesus as Mother: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ay, Francesca. 1997.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den, Barbara. translated by Thomas Dunlap. *The Woma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t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Douglas, Mary. 1973.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London: Barrie and Jenkins)

Ko, Dorothy(高彥頤). 1999. "Painful Histories and The History of Pain: Rethinking Femal Voice and Subjectivity," 發表於「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整體之重建」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9/6/25)

Furth, Charlotte. 1986. "Blood, Body and Gender: Medical Images of the Female Condition in China," in *Chinese Science* 7 : 43-66.

———. 1987.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 7-35.

———. 1999.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uriyama, Shigehisa. 1999.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Steinberg, Leo. 1983. *The Sexuality of Christ in Renaissance Art and in Modern Oblivi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Charlotte Furth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popular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nowadays is the product of previous scholarship in history, humanities and anthropology. Although the trend was pioneered by symbolic anthropologists and spread by Foucault and his followers, feminis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surveying recent scholarship and trying to place my own work in this context, I identify two patterns of interpretation: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experience or perception. I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pistemological issues that arise when we take the human body as the topic of our scholarly inquiry.

Key Words: body history, history of medicine, body, representation, perception